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鞍山老干部回忆录

钢都人物传

(二)

中共鞍山市委老干部局编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鞍山老干部回忆录

钢都人物传

(二)

中共鞍山市委老干部局 编

1995年9月 鞍山

编辑出版者	中共鞍山市委老干部局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刷 者	鞍山市五星电脑印刷公司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张魁生

副主编:陈 群 尹家太 惠 涛

编 委:李大桂 马涵根 李国华

陈淑云 于卫星 何正茂

宋晓梅

前 言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根本转折，它不仅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决定了人类的命运。重现历史的辉煌，追踪历史发展的轨迹，思索它涵盖的深远内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们编纂了鞍山市抗日老干部回忆录。

这本回忆录真实地记录了我市 23 名老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宁死不屈、英勇斗争的英雄业绩，并以多视角的写真，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回顾历史，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打破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推动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具有巨大的和深远的影响。另外，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实质及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缅怀革命先烈，告慰死难烈士，从而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如今，抗日战争的烽烟已散，但战争给人留下的思索与记忆却是沉重的。知往鉴来，弘扬民族正气，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团结一心，爱我中华。

历史的云烟，挡不住对往事的遥思。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接续历史与未来的坦途，而过去的足迹将更坚定地向前延伸。让我们大家都勿忘历史，珍惜今天，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而努力奋斗。

由于时间仓促，编写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中共鞍山市委老干部局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日

目 录

悠悠往事永难忘	谷正荣(1)
平遥纪事	鲁 森(21)
少奇同志初到华中	吴一非(34)
红色交通线	铁 秋(37)
琅琅读书声	陈 群(41)
怀念罗瑞卿主任	王育敬(44)
新四军救我出伪军监牢	马涵根(48)
险渡长江	朱 卫(57)
嘉行义举三支枪	马涵根(72)
记苏中兴化沈家舍交通站	罗林辉(78)
武强县抗日斗争	张昆山(80)
陈庄歼灭战	刘成玉(91)
鱼水深情	李成玉(96)
同心协力济伤员	王仪亭(107)
血的回忆	蒋守权(113)
难忘的苏中小茅山孙家堡战斗	罗林辉(123)
敌后武工队的政治攻势	孙玉波(126)
难忘的印象	余新元(128)
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	王育敬(133)
我要当八路军	冷学为(137)
智取敌炮楼	张正恩(139)
抗日二、三事	徐福元(144)
七千子弟兵 千里赴延安	郑 钟(148)
在 115 师的几次战斗	邓延武(167)
回忆抗日时期的战斗生活	徐福元(173)
难忘的战斗岁月	刘健民(180)

悠悠往事永难忘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

谷正荣

岁月的流水会把平淡的记忆冲刷得干干净净，也能将难忘的往事砥砺得更加清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抚今追昔，我这个曾经历 4 年流亡学生生活、8 年抗战的老兵，自然会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历程。

含恨入关

1917 年 10 月，我出生在现鞍山市郊区陈家台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中。1931 年“9·18”事变前，我正在辽阳市东街税科司高级小学读书。当时陈家台村归辽阳管辖。辽阳，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城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它地处交通要道，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它文化教育事业发达，人杰地灵，出了许多文化名人，誉满三江的关东才子王尔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商贾云集，市井繁华；它的自然景观更是美不胜收，城内洁白的古塔高耸入云，熠熠生辉；高丽门外是碧波荡漾的太子河；城东南是全国著名的千山风景区，巍巍千朵莲花山，壮美绮丽。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文学，经常在学习之余写诗撰赋赞美家乡，虽然那时所写的东西比较粗浅，但字里行间充满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寄托着浓浓的乡情。

“9·18”事变的第二天，辽阳市内一片混乱，街上的商行、银号、当铺纷纷关门停业；行人匆匆离去，个个表情沮丧；学校里也失去了往日的井然，老师们在交头接耳地议论，整个校园沸沸扬扬。我和同学们都预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不幸

事件。果不出所料，学校召开大会，在悲愤的气氛中，宣布了发生“9·18”事变的消息。这时我们才知道，万恶的日本强盗占领了沈阳北大营，东北军被迫撤走。校长对师生们说，学校暂时解散，能复课时再行通知。我和同学们听了后心里十分难过，大家心里都明白，复课返校只是渺茫的希望。老师们把一批批同学送出校门之外，依依惜别。同学们列队向老师鞠躬，深情地敬最后一个礼，然后便各奔东西了。同学们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离开学校的两年间，事态急剧地发生着变化。“9·18”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投靠日寇的汉奸横行霸道，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我家的境况也日益艰难。当时许多年轻女子为防不测，纷纷出嫁成婚。父母亲也于1932年急急忙忙为我和早已选定的一个女孩操办了婚事，那年我才15岁。为了寻找生活出路，翌年，我先到立山一家烧锅干活，整天抬大酒桶，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竭。可狠心的老板还硬逼我没完没了地给他干家务杂活，我愤然离开了这家烧锅。后来，我到沙河世和福杂货店当学徒，在这两年中，我不仅挨累受罪，而且亲眼目睹了这些道貌岸然的奸商，白天满口仁义道德，夜里却干起往酒中兑水、往油里掺假的卑鄙勾当。更令我气愤的是在鞍山八卦沟，我多次看到凶残的日本人，无端欺凌蹂躏中国同胞。

求学不成，谋生无路，山河破碎，国仇家恨，使我义愤填膺。我夜不能寐，这当亡国奴的日子何时才能出头呢？这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强盗何时才能赶走？这黑暗的世道何时才是尽头？我当时虽然年龄不大，学识有限，但我是一个有热血的中国少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世代相传的中国人的古训

是溶在血液中的。我热切地企盼找到一条救国谋生的出路。

终于，有一天我从远房亲属的口中得知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兴办了专门接纳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许多有志抗日救亡的青年纷纷奔赴那里。我决定前往投奔。我何尝不想过温馨的小家庭生活呢？何尝不眷恋祖祖辈辈生息的黑土地呢？但是为了救国和谋生我必须寻找一条生路。经过一番耐心地说服取得了父母双亲的同意，我终于踏上了使我一生发生重大变化的漫漫征程。

为了节省几个钱和躲避山海关的严格盘查，我决计取道营口乘船去天津，再由天津赶赴北平。为了不惊动四邻，1934年农历四月初八这天，父亲送我起程，佯称去鞍山赶庙会。慈母泪流满面，倚门目送我走出村子，一直到看不见时才依依离去。我们父子俩一直徒步走到鞍山火车站，一路上父亲殷殷叮嘱，出门在外谨慎处世，堂堂做人，这时，我才从内心深处理解“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包含的深沉情感。当我从检票口走向站台挥手向父亲道别时，他一边摆手，一边擦着脸颊上的泪水。父亲是轻易不流泪的刚强汉子，但这时他却忍不住潸然泪下。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一个穷孩子孤身闯世界，前途茫茫困难重重啊！我一步一回头，不知是怎样走上站台的。

揣着好不容易东挪西借的几块光洋，在营口我搭乘了一艘英国轮船。呜一鸣！在震耳欲聋的汽笛声中，轮船起锚了，岸上的景物渐渐消失在水天一色的视野中，此去关山万重，别了东北，别了可爱的家乡，别了难舍难离的亲人们！倚着船栏，望着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万顷碧波、汹涌澎湃的大海，我思绪万千。滚滚的波涛，你多像3000万同胞心中的怒潮，波涛，你怒吼吧，海潮你来得更猛烈些吧，总有一天，这怒潮要冲出

一个重见光明的东北！

四年流亡

到达北平后，我先是投住到一个亲戚家。万万没想到，他已失业在家半年多了，每月靠向亲友东挪西借或典当旧衣物勉强维持生活，全家陷入了穷困潦倒的生活境地。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门路的人，在社会上要想谋个一差半职，混个半暖一饱的，真是困难已极，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不久，我考入了“东北难民子弟职业学校”。顾名思义，这是专门为流亡到北平的东北青少年而开设的。其实，与其说是考入倒不如说是收留更为确切，因为只要是东北流亡学生，就一概接纳入校，结果，年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校址设在西直门外的万寿寺，这是一座3层大殿的寺院，500多名学生吃住全在院中，因为一切都是免费的，所以学生的吃、住和学习条件都相当简陋。吃的是高粱米饭，喝的是大菜汤；将前后几层大殿里的佛像推倒即成了教室，每殿用土坯砌成2列10排长条书桌和坐凳，每排坐12人；在砖墙上用黑灰抹成一个长方形即当作黑板；整个教室里没有一件木制用具；偏殿里砌起大炕就成了学生们的寝室。就是这样简陋的条件，对于我们流亡学生来说已感到挺满足了，毕竟是有了安身之处，毕竟可以在一起共图抗日救亡的大业了。由于学校的各种经费全部是靠募捐凑来的，所以仅一年多时间就难以维系了，最后不得不停办，合并到东北中学去了。东北中学是由张学良将军亲自创办的，旨在培养抗日急需的各种人才。当时校址位于西单皮库胡同24号，东北中学各方面条件较之职业学校要好得多，不但有了木制桌椅，而且都是正规的教室。同学们按文化程度分成高低不同的班级，既学文化课，又接受军事训练。当时，全校除

2 位关内籍的教员外,其余师生都是清一色的东北人,真是名副其实的东北中学。

1935 年秋,因为受到南京政府和日本签定的卖国条约的约束,驻扎在北平的东北军队以及几所主要学校被迫迁离北平。东北中学迁往豫鄂两省交界的鸡公山。鸡公山虽然不像庐山那样名闻天下,却也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避暑胜地。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到处是流水潺潺的小溪。到了夏季,蜂飞蝶舞,花香鸟语,更是迷人。每逢酷暑,居住在武汉、开封一些闹市的官僚、政客和绅商,便携儿带女,乘坐滑竿、轿子来到这里避暑游玩。鸡公山的顶端,是一片很大的平坦开阔地,随着山势和地形,修建了各式各样的中西式别墅,最为高大华丽的是靳家大楼和肖家大楼。东北中学迁到此地后,一幢做了学生的宿舍楼,一幢成为教学楼。山上还有一条不太长的繁华街道,旅社、饭馆和商店林立两旁。我现在还记得,鸡公山上盛产一种名叫洋桃的水果。它大小和野桃差不多,形状酷似猕猴的头,故亦称猕猴桃。它没有桃核,籽粒像芝麻那样,吃起来甜中稍带酸,味道特别好。然而,这里的一切再好,对于我们这些流亡到内地的东北青年学生来讲,没有丝毫的吸引力。鸡公山的风光再美,也比不上家乡的千山美;鸡公山的洋桃再甜,也比不上家乡的香水梨甜!家乡的泥土,什么时候能再捧上一把?家乡的亲人,什么时候能再见上一面?

当时东北中学的教师绝大部分是具有爱国抗日思想的。由于受到他们的熏陶和影响,我先后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不仅丰富了知识,而且从中受到投身革命的启蒙教育。对我影响较深的是阎述诗、马献图等老师。他们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述抗日救

国的革命道理,议论东北青年的前途和出路,有时还把东北和华北抗日斗争的消息讲给我们听。特别是对东北军、红军、西安以及延安的种种情况讲得绘声绘色,维妙维肖。我们则是如饥似渴地听讲,这比听专业课更吸引人。

1936年暑假前不久,同学们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全校学生发起了一次震动当局的学潮。经过10多天的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学潮之后,张学良亲自兼任了校长,孙一民任教育长。这年11月,经黄永春、陈洪桥的介绍,我加入了“民先”,矢志抗日救国的决心更加坚定。

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学校进一步强化了军事训练。由东北军选派数位年轻军官到学校任军事教官,梁成恭任主任教官。同时,给学校发了一批军训的武器。同学们拿着这些枪支,高兴得不得了,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大家都说,有了这些真家伙,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到前线去杀东洋鬼子了。可以说,这600多名武装起来的又具有一定军事素质的学生军,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队伍。但是万万没想到,就在“西安事变”发生不久的一个早晨,天还黑呼呼的,鸡公山突然布满了武汉方面调来的国民党军队,把东北中学包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气氛紧张、形势严峻,全校师生为之愤慨,很想抵抗。由于势孤力单,寡不敌众,全体师生只好眼含着悲愤的泪水,胸怀着仇恨的怒火,眼巴巴看着被人家缴了械,处在萌芽状态的抗日力量就这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在摇篮之中。

在东北中学有一项特殊的集体就餐。不管在北平,还是在鸡公山,每逢“9.18”这个令人万分悲痛而又难忘的日子,东北中学都要在这一天的早晨,吃一顿掺有黄连的高粱米饭,吃起来真是难以形容的苦呀!口苦,心苦,浑身都苦!卧薪尝胆,誓

报国仇！全体师生都在一起吃这顿饭，鼻涕眼泪不断地淌到饭碗里，有谁能够咽得下去？有谁不在思乡念亲？有谁不为国仇家恨而怒火满腔？

尽管“西安事变”后的白色恐怖更严重了。但是，要求抗日救国实行民主的热潮，象波涛滚滚的长江，象咆哮如雷的黄河，一浪高过一浪。就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剧变时期，就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枪声快要打响之前的紧急关头，在华北、在中原、在全中国广泛流传着一支又一支动人心魄的抗日救亡歌曲。这些歌曲犹如战斗的号角，有力的呼唤广大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爱国同胞和有志之士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去。而最为流行的脍炙人口、激动人心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步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每当我们唱起《五月的鲜花》便感到格外的自豪，因为这首歌的曲作者就是我们敬爱的阎述诗老师。

“西安事变”使许多老师和同学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也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真正实现抗日救国。于是我横下一条心：找共产党去！我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告诉父母亲我在外面买卖没做好，家中的事该如何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总之，别指望我了。我也不再给家里写信了。不断地学习和斗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境界获得了新的升华，我已抱定为抗日救国献出一切，直至宝贵生命的决心。正因为这样，我才写下这封特殊的信。我在信中随寄了一张自己最喜爱的照片，照片上的我，身穿白衬衣，站在鸡公山峰峦上，双眼凝视北方，身后是连绵的群峰、寥廓的天空。我也想这封信会给家人带来无尽的悲伤，但我又不得不这样做。抗战胜利，我回到家乡后，又看到了这张家人保存下来的已有些

发黄的珍贵照片。

奔 赴 延 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打响，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日军大举进犯，平津失守，学校奉命准备向湖南桃花坪迁移。这时学校已停止正常上课，秩序也较为混乱，国民党特务时常闯进学校抓捕共产党员。但这些师生往往都是事先得知消息，早已无影无踪，气得特务们只好贴几张通缉令便悻悻地走了。

这时，东北中学的师生抗日情绪高涨，许多人都希望到抗日战争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久，除少数同学随校南迁之外，绝大多数同学都分赴延安、太原和河北，投身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之中。

10月间，我与同学梁成义离开学校来到西安，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推荐，几天之后我们到达了陕北安吴堡青训班。当时冯文彬任青训班的主任，胡乔木任副主任。从内地奔赴延安的青年大部分都要在这里培训一个月左右。培训的主要内容是由领导授课，讲述抗战的形势，介绍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青训班毕业后，根据每个人的愿望和专长以及抗日战争的需要，确定下一步的去向。有的同志被派往前线，有的同志分别到抗大、陕北公学、鲁艺继续学习。我被分到陕北公学。

1937年12月底，我们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望着高高耸立的宝塔山，看着奔流不息的延河水，大家欢呼雀跃，激动不已。陕北公学的校长成仿吾、教育长罗迈（李维汉）、教务主任邵式平、军事主任周纯全和全校师生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我被编入第2期第12大队，大队长是廖作华。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延安是一片富有神奇魅力的黄土地，

到处是令人感到新奇的事物，到处是使我们受到振奋的场景，到处是欢歌笑语……，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虽然物质匮乏、条件简陋、生活清苦，但人们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高涨着抗日救国的激情；这里各级首长都有，但个个与民同甘共苦、平易近人，没有半点特殊。这里驻军众多，但与老百姓亲如一家，水乳交融。

清晨，嘹亮的军号声回响在宝塔山下，无数支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迎着黎明的曙光开始了一天紧张的操练。

夜暮降临，一座座依山而建的窑洞亮起一盏盏灯光，远远望去，与天空的繁星连在一起，犹如灿烂的星汉撒落在延河两岸，啊！多美的延安！

在陕北公学的进一步深入学习和不断地所感所获，使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我愈来愈感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才能走出苦海，才会拥有光明的前途。于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更加迫切。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经大队协理员石献之和小队长宋启明的介绍，1938年4月4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在布置一新的大队学习室里，我们7位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庄重地举手宣誓。想到自己孤身一人含恨入关，历经4年流亡学生的生活，终于找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我心潮澎湃，激情难抑，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

当时延安党组织的活动尚不是公开的。张国焘借祭扫黄陵之机叛党逃往西安的事件发生之后，党中央要求迅速传达到每一个党员。陕北公学把各队党员召集到一起，拉到延安东关外的一条山沟里开紧急会议。在会场我与在11大队学习的

老同学梁成义相遇。由于是开会，我俩不能交谈，四目久久相对而视，紧紧相握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同是流亡学生，同赴延安，如今又一同加入了党组织。共同的志向与共同的兴奋在相对无言中彼此进行了心领神会的交流，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陕北公学期间，我有幸听到毛泽东主席做的抗日战争形势报告。那天，公学的师生集中到一个广场，讲坛设在广场前面的大棚子里，讲坛上摆着一张案板式的木桌，上面放着一只茶杯。毛主席讲到兴奋处站起来，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有力地挥动。毛主席讲到激动人心之处，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报告结束之后，坐在前面的女同学拥向讲坛，拿出事先准备的笔记本请毛主席签名留念。我们男同学不好意思上前去挤，只能站在一旁用羡慕的目光观望，或是向女同学借笔记本，欣赏毛主席那流畅、遒劲的手迹。

在陕北公学，我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大众哲学》的作者艾思奇亲自为我们讲授哲学课，刘之明即陈祖騫（东北光复后的第一任鞍山书记）与吴亮平讲授社会科学，周纯全讲游击战争。他们的课讲得相当精采，既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又联系实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陕北公学学习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时间，但在我的成长道路上却是一个重大的飞跃。我不仅由一个有朴素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且理论知识获得了空前的升华，使我终生受益。全国解放后，我们这些当年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延安小米，喝过延河水的老同志每每谈及延安都充满了一往深情。延安，你哺育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延安，你不愧是革命的圣地和摇篮，不愧是民族解放的灯塔和抗战胜利的希望！

晋 中 烽 火

1938年4月中旬,我结束了在陕北3个月的学习后,被组织上分配到晋西北续范亭领导下的保安一支队任警卫连指导员。那时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活跃的,队伍开到哪里,宣传鼓动工作就做到哪里,标语就贴到哪里,铿锵有力的歌声就唱到哪里,战斗也相继不断的发生。我们第一次与日伪军交火是在孝子渠,一支队的一个营与前来进犯的敌人狭路相逢,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战士打得很顽强。敌人机关枪、掷弹筒都用上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真刀真枪的战斗,起初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紧张,可打了几仗之后,枪炮声听多了,很快也就习以为常了。1939年初,我所在部队改编,我被派往地方从事抗日斗争,在晋西北第八专署所辖的文水县任教育科长,当时县长是顾永田。晋西反顽斗争后他被调任八专署专员,在一次反扫荡中不幸牺牲。后来李生华任文水县县长。文水县分五个区,大部分是平川地带。平川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我们征集新兵,筹集粮食和布匹主要依靠这里的人民群众来解决。敌人为了扩大占领区,不断向根据地进行扫荡。当时,按斗争的态势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区域:一是抗日军民的根据地,大部分属贫困山区;二是敌来我往拉锯的游击区;三是敌人盘踞的敌占区。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小说《晋阳秋》描写的抗日斗争,就是依据包括这个地区在内的晋中抗战史实而创作的。1940年初,三区区长李生华调任文水县县长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兼任了二区区长。

那时,我们每个区都有一支20多人的武工队,全部轻装、短枪,骑自行车,行动迅速,昼息夜出,神出鬼没打击敌伪,特